

# 「火紅年代」與 香港左翼激進主義思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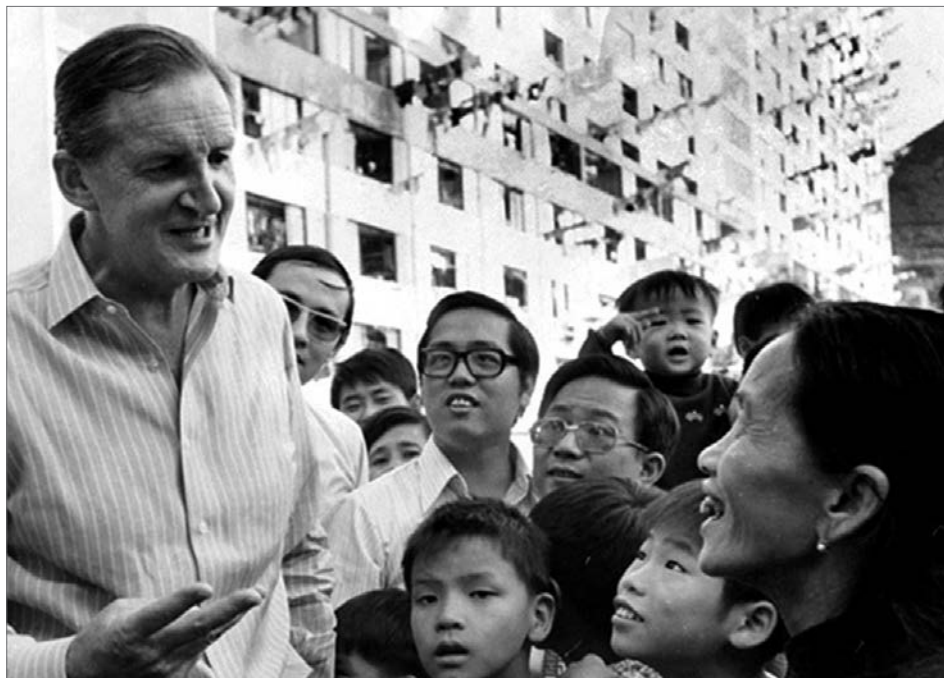
• 羅永生

**摘要：**1960、70年代的世界青年反叛浪潮已經有很多研究和討論，但這類研究甚少把香港作為研究對象。本文追溯戰後殖民主義和冷戰對抗如何影響這個「殖民—難民」城市，接着探討那個被稱為「火紅年代」的時期，香港左翼激進主義思潮如何影響香港的學生運動、青年運動和80年代出現的民主運動。本文概括地討論了「左派」在香港的複雜意涵，也勾勒了國粹派、托派、社會派、激進神學和文化左翼等多樣的左翼思想對70年代青年及大學生的衝擊，回顧了他們對中國認同的爭議、對殖民地現實的態度和策略，以及對學運路線不同側重點的演繹。文章嘗試指出，這些思潮的湧現和他們之間的爭議，既受到60年代世界青年反叛浪潮的影響，但也受制於中國和本地的特殊因素。這些左翼激進主義力量雖然無法改變香港政治和經濟權力的大格局，但卻為香港社會的進一步發展預備了特殊的異議和抵抗空間。

**關鍵詞：**「火紅年代」 激進主義 左翼 學生運動 香港

「激進主義」從來都不是香港政府向外國人介紹香港時會用上的詞彙，因為香港一向習慣被描述為一個全面功利化的經濟城市。唯一例外的是上世紀20年代的「省港大罷工」和60年代的「六七暴動」。可是，這些「例外」往往就像一些突如其來的災難一般，被描述成只是短暫地影響了香港的繁榮安定。當一切回復「正常」時，香港就會自動地重新啟動那列由「一條小漁村」開出的快車，直駛往她的終點「國際大都會」。

70年代的香港歷史往往就是這樣被淡忘。過去，主流論述都把70年代看成是「暴動後」百廢待舉的經濟快速增長期，港督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開明施政、建設廉政、廣建公屋等大計，這一切都是向着一個全盛的發展時



港督麥理浩在任期間開明施政、建設廉政、廣建公屋。(資料圖片)

期推進。直至近年香港本土意識迅速冒升，70年代的香港社會才開始引起更多深入討論，特別是連繫到這個時期對「戰後嬰兒潮」一代的影響。而原先只是在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圈子流傳的「火紅年代」一詞，方才重新出土，進入公共討論的範圍。

所謂「火紅年代」，其實並非實指香港出現激進政治的時代，因為戰後影響最大的激進政治行動，是發生在1967年的那場由親中左派陣營發動的六七暴動。但「火紅年代」一詞所涵蓋的時間，一般並不包括六七暴動，而是經過暴動後兩年左右的政治沉寂期，由1969年直至1982年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開始談判的一個較長時段的70年代。這段日子裏並沒有發生大型的社會動盪，但卻是香港土生土長一代最熱心投身於學生和青年運動、也是種種左傾激進思潮雄據大學生和青年活躍份子思想的年代，所以被當時參加這些學生和青年運動的活躍份子稱之為「火紅年代」。

不過，正因為「火紅年代」的意義在於從戰後社會打開一個新的局面，所以要了解香港「火紅年代」的重要性，就不能不從戰後香港的文化及政治格局，亦即所謂冷戰對抗以及戰後殖民體制談起。

## 一 「殖民—難民」城市下的冷戰對抗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雖曾有收回香港之計劃，奈何忙於應付與共產黨的內戰，無力與英國周旋，於是英國順利地從日本人手上直接接收香港。旋即在國共內戰中佔上風的中共，雖然奪取了大陸上大部分國土，卻在香港實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默許此地繼續

作為英國殖民地而存在。戰亂和政治運動導致大量內地難民逃港，把香港變成一個難民暫居地，結果孕育了一個獨特的「殖民—難民」城市。

由於英國人希望維持香港為一自由港，因此國民黨和共產黨都能夠繼續並存，而且維持他們在香港活動的權利。這使得香港這個「殖民—難民」城市，也成為一個冷戰雙方相互延續其對敵鬥爭的中間地帶。在不危及殖民者保持此地安定的前提下，雙方持續進行文化和意識形態鬥爭。右派方面，國民黨繼續支持他們過去在香港建立的各類文教社會機構，而美國也在香港非正式地實行「美元文化」政策，資助反共的教育家開辦教學事業，作家可以寫反共小說拿取稿費，反共的書刊得以印行。左派方面，中共也擴展在香港的工作。為了抗衡右派在香港的反共活動和宣傳，中共也針鋒相對地在香港建立了一整套的工商團體、社會組織和文教系統，直接或間接管理和指揮。

於是，冷戰對抗令香港出現了兩套各有政治所屬、互相敵對的冷戰文化系統。國共雙方在香港都辦有代表官方立場的「黨報」，以及照顧不同階層文化品味需要的報刊。從兒童讀物到中小學生文藝雜誌，以至大專青年的書刊，左、右兩方都有各自的地盤。冷戰文化對抗使香港的報業特別繁盛，其他文化事業也百花齊放，成為海峽兩岸之間一個獨特的自由空間<sup>①</sup>。不過，由於文化發展受冷戰政治的影響，非黑即白的政治宣傳也缺少與本地生活的連繫，雙方宣揚的要不就是對「紅色中國」硬生生的歌功頌德，要不就是共匪萬惡必亡的詛咒，或者飄泊寄居的「南來文人」對「中國」的懷戀。漸漸地，這些為冷戰的對立立場所左右的思想和文化，與本地土生土長的新一代產生了隔閡與疏離，原因是它們都沒有貼近香港青年新一代的經驗和想像。香港青年新一代對中國沒有切身的體驗和感受，冷戰雙方對中國的描寫又是如此極端和完全對立，青年對身處社會的關懷，也因為不民主的殖民政府的冷漠而無處安放，加上缺乏參與社會的渠道，所以處身於極為困惑的迷失狀態。

## 二 1960年代的世界青年反叛浪潮

事實上，青年人對戰後世界秩序的不滿並不只是發生在香港。美蘇之間的軍備競賽，軍事—工業體制的勢力無限擴張，使追求獨立自主、掙脫殖民宰制的第三世界，反成為美蘇各自擴展勢力的新戰場。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威脅以及世界各地各種不平等和危機，使受到人權、自由、平等等理想主義價值呼召的青年人，為了表達對世界局勢以及既有體制的不滿，在60年代爆發出廣泛的反叛呼聲。在西方，黑人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婦女運動、同性戀運動、嬉皮士運動等相繼爆發。反叛的呼聲也在東歐民主運動中得到響應，例如被蘇軍殘酷鎮壓的「布拉格之春」。

這股橫跨東西方的世界性反叛運動浪潮，當然也包括中國大陸發生的文化大革命。在西方，不少青年人視60年代文革中敢於衝擊共產黨高層官僚的紅衛兵為青年造反的楷模，而毛澤東當時支持的「第三世界」路線、不結盟運動，也表現為一種拒絕在美蘇之間選擇任何一方的反冷戰立場。這種不再在

「美帝」和「蘇修」任何一方尋找出路的想法，反映在為青年反叛高歌的西方「新左派」思想中，他們要求在資本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斯大林主義）之外，尋求「第三條道路」。文革要求人們在文化意識上進行徹底革命，也呼應了「新左派」提出要在文化上對工業社會資本主義生活價值實行「大拒絕」。

可是，這股主要在西方世界出現的青年「抗衡文化」（Counter-culture）和「新左派」思想並沒有對香港產生即時影響，因為在殖民和冷戰思維支配下的文化傳播和教育機構，不是掌握在殖民政府手上，就是受親中共左派或親國民黨右派把持。當時除了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之外，就只有一些規模相當小的私立大專院校。香港大學被普遍視為為殖民地培養管治精英的堡壘；其他院校或多或少都有反共的傳統——學生都為老師支持的反共文化所薰陶。不過，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對於「新左派」在西方所掀起的青年反叛思潮，其實抱有極大的懷疑態度；更對中共在60年代發動的文革持絕對的否定態度。而「新左派」雖然對文革存有很多幻想，但香港的親中左派對於西方學潮卻也並不熱衷，遑論推動相關思想的散播。

事實上，西方戰後新一代萌生的這種反叛體制的思潮並非一場偶發的事變，而是早早反映在文學、藝術、哲學等領域的新思潮、新理論運動中。可是，由於受限於冷戰文化對抗的既定框架，香港的左派和右派都沒有積極地宣揚和引介這些吸引青年人「離經叛道」、帶有激進主義意味的文化思想資源。又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們都小心翼翼地將這些新思想置於一個安全地帶。

例如本來頗受青年歡迎的右派青年刊物《中國學生周報》，為了迎合世界各地出現的青年運動和新思潮的湧現，在60年代也進行了改版，引介了一些西方新思潮，成為歐洲「新浪潮」電影文化在香港最初的提倡者。而在美元資助下的友聯機構，也試辦過「創建實驗學院」，最後並蘊釀了《盤古》月刊（下詳）的出版。這些變革的目的，在於迎合青年對新事物的好奇心，把新理論、新觀點化為精神消費。雖然這些來自西方的新思潮和新文化具有整個西方世界出現的青年反叛浪潮背景，但右派刊物對它們的介紹，並沒有連結到政治上的抗議，更加沒有連結到本地狀況。當年一位就讀珠海書院的青年學生吳仲賢（《70年代雙周刊》創辦人之一）在回顧這一年代時說，這些只是一種「形而上的反叛」，因為它們並沒有推動社會改革的力量<sup>②</sup>。

左派方面，由於一直以來都是以宣傳愛國主義的統戰為主，以不挑戰港英的殖民統治為大前提，所以左派在香港的青年工作都是以文娛康樂活動為主，並以爭取青年認識和認同祖國為目的。在傳統「愛國」學校之外，左派也以地下形式對香港主流精英名校的青年進行不張揚的統戰。但因為香港大學的親殖民政府傳統和私立大專的親國民黨右派傳統，左派一直對大專學界都影響不大。不過，面對60年代世界青年學生政治覺醒的大趨勢，親中左派也曾經嘗試在大專學界加強影響。例如，「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發動學生以義務工作的方式，去偏遠和貧困的地區做一些修橋補路式的服務工作，貫徹左派向來主張的社會關懷。然而這些服務和組織工作都是以「非政治化」的方式進行，避免發動學生去工廠支援勞工運動。這些軟性的做法都是為了配合中共政策，一方面要團結青年人於愛國主義旗下，另一方面希望消弭大學生採取激進行動的可能。



### 三 文化大革命與六七暴動的影響

不過，60年代的香港本身已經是百孔千瘡，在不思改革的殖民體制下，經濟縱有成長，但階級矛盾和社會危機卻一觸即發。事實上，在文革還未在中國爆發的1966年4月，香港就發生了因為天星小輪加價而引發的九龍騷動，造成1人死亡，18人受傷，1,800多人被捕。當時左派報章的輿論也支持殖民政府平息動亂。可是，國內文革的爆發，急速地為親中左派的路線轉向提供了條件。1967年5月，九龍新蒲崗一間人造膠花廠發生的工潮，迅速被香港親中左派轉化成「反英抗暴」的大暴亂（「五月風暴」）。六七暴動使不少無辜的香港人受到傷害，因而他們對左派的支持在暴動之後大幅下降<sup>③</sup>。此後，保守主義盛行，防左恐共的氣氛濃厚，殖民政府顯然在六七暴動中爭取到相當的管治正當性。從發起暴動的左派陣營來說，暴動的失敗是毫無疑問的。不過，暴動為香港所帶來的長遠影響，卻不能單從左派後來的命運來評斷。因為這場在香港發生的暴動，畢竟是在殖民地香港發生。

六七暴動的參與者以左派組織和號召而來的群眾為主，但也引來不少圍觀的青年，「造反有理」的意識也廣泛散播，顯見在殖民政府不思進取、欠缺改革的情況下，早已積聚了不少社會矛盾和民間怨氣。只不過當時的大學生組織並沒有出來支持左派，那些傾向溫和保守的學生組織更紛紛支持殖民政府鎮壓暴動，原因是左派過激的鬥爭策略最終脫離了群眾。殖民政府的管治策略在暴動之後反而由被動變為主動。麥理浩時代大刀闊斧進行的改革和社會建設，修正了戰後以來一直奉行的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為晚期殖民政府建立了一種管治正當性。

不過，雖然左派的挫敗令殖民政府有了喘息的空間，但卻沒有使右派得益，事實上右派也因為暴動的出現而顯得手足無措。在冷戰年代覺醒較早而



1966年4月，天星小輪加價引發的九龍騷動。（資料圖片）

又有獨立思考的青年，多半受右派的新儒家知識份子那套文化民族主義的教養，寄望將來以文化復興中國。而右派主理的刊物，諸如《中國學生周報》雖然成功地以文化藝術團結了不少青年人，但面對突如其來的暴動，卻完全提供不了甚麼解釋，遑論領導運動<sup>④</sup>。暴動帶來破壞，最後也因被鎮壓和失去支持而平息，但青年對當時社會現狀的不滿已被激發。右派青年刊物因而失去了讀者的信任，它們提倡的文化保守主義亦失去了對青年的感召力，讀者反感覺刊物內容愈來愈老化，未能回應他們被殖民統治的現實。

土生土長的新一代精英雖然大部分都不贊同暴動的方法和目標，但暴動也激發了他們的社會意識，令他們決意要從父母一輩各家自掃門前雪的難民心態逃脫出來。暴動發生後的幾年內，大學校園充滿了焦慮不安和失落的情緒，因為暴動暴露了社會的不公平和其他弊病。青年人對殖民地體制的不滿急劇增加，但他們卻沒有方法去改變現狀，更不知道香港的未來和前路應如何走下去。於是，大學校園關於香港前途的討論日漸增多，也有愈來愈多的青年人和大學生希望將爭論轉化為行動。

#### 四 百花齊放的「火紅年代」

在六七暴動之後，親中左派被社會主流所厭棄，社會上亦瀰漫政治無力感以及恐左反共的氣氛。然而，精英大學生和殖民政府中一些開明的華籍議員，同樣感受到暴動所揭示的社會深層問題遠非僅是來自外界的影響，殖民政府過去的施政也負有一部分責任。在1968到1969年之間，他們共同發起了「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下稱「中文運動」）。初則小心翼翼，只敢開開研討會，寫寫報告，陳情上達，乞求政府體察民意。但見政府不為所動，於是把訴求化為公民行動，上街派發傳單和發起簽名運動，並且號召海外香港人聲援。其後，主張以激進方式推動運動、由托派和無政府主義者於1970年1月創辦的新型文化刊物《70年代雙周刊》，主動發起大學以外的青年工人參加，並發展中學生的中文運動組織，中文運動就開始如火如荼地大步開展。

親中左派原先對中文運動態度冷漠，甚至對之冷嘲熱諷，認為這場運動只是粉飾殖民統治的「民主櫥窗」，為殖民政府建立威信，推動者的目的其實是尋求「港獨」。但後期看見運動受到大部分學生支持，於是改變方針和政策，以求主動去領導學生運動<sup>⑤</sup>。雖然中文運動並沒有即時取得顯著成效，但市民和大學生的社會動員，打破了暴動後籠罩整個社會的冷漠氣氛和政治無力感，也開創了自親中左派發起的暴動失敗後，由民間組織和平、非暴力公民抗爭的先河。

而在1970年代中文運動進入低潮後不久，台灣和香港就先後為了釣魚台問題發起第一波的「保釣運動」，左派青年工作又重新活躍起來，在保釣運動中與托派及其他傳統的學生團體爭奪領導地位。當時參加保釣運動的有三個主要派別，包括以托派為主的「聯陣」（保衛釣魚台聯合陣線）、毛派的「保釣會」（香港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和代表大學學生會的「學聯」（香港專上學生

聯會)。他們的保釣綱領雖然並不一致，有着種種分歧，但整體來說在動員學生參與方面十分成功。保釣運動大大刺激了香港青年的民族意識，更因為在一次示威行動中，洋人警司向學生施加暴力，令他們非常反感，因而保衛釣魚台主權的行動又加添了反對殖民政府的意義，使六七暴動失敗後擱置了的「反殖」訴求重新出場<sup>⑥</sup>。可是，保釣運動之後，把反殖訴求視為要務的不再是親中的左派(或毛派)，而是托派。

那些信奉毛澤東思想(毛派)的學生領導，也被稱為「國粹派」。他們承接保釣運動之後的民族主義思潮，取得學生運動的領導地位，並且把學生中的民族主義熱情轉移往認識新中國的方向。當年學運人士把他們稱為「國粹派」，其意不是指他們是清末民初提倡宏揚傳統「國粹」的文化保守派，而是戲稱他們是凡中共路線必緊緊跟隨、缺乏獨立思考的一群。他們組織嚴密，實行中共群眾運動的方法，在不同的組織據點滲透發展。他們領導學運，以「認祖」(認識祖國)和「關社」(關心社會)作為口號<sup>⑦</sup>。他們主要透過各種活動，例如「中國週」，帶領同學「認識新中國」，宣傳中共的成就和文革中的「社會主義新生事物」<sup>⑧</sup>。他們也常組織同學參加透過地下安排的「回國參觀訪問團」，參觀革命聖地，直接與中國內地青年工作單位和黨團部門連繫學習。他們以「認祖」工作為重心，相對之下，較為次要的是「關社」，更加不輕易帶領同學介入社會公義事件的抗爭。所以，學運在國粹派領導下，思想上相對「激進」，但行動上絕不激進。

70年代初，中國尚在「十年文革」的中期。毛澤東已經改變親蘇的戰略，把「蘇修」視為頭號敵人，預期不久就會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為了應付新的世界格局，中共實行與西方和好的政策，與美國建交，並加入聯合國。當時人造衛星上天、試爆原子彈等舉動，都意在說服西方：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強國。在西方興起的「中國熱」底下，不少人開始對「新中國」另眼相看。中共也加強了對海外華人的統戰，勸說他們放棄反共復國的幻想和冷戰對抗心態，重新回歸新中國尋求出路。香港就成為一個海外華人知識份子圈中開展「中國統一運動」的據點，李怡1970年2月創辦的《七十年代》月刊(後改名為《九十年代》)就成為其中一個統戰工具(刊物的名稱顯然是針對前述的《70年代雙周刊》)。

另一份成為國粹派主要思想陣地的刊物是《盤古》月刊。1967年創辦的《盤古》，原來是由一群以《中國學生周報》為基地的香港文化精英成立，成員包括陳炳藻、戴天、胡菊人、梁寶耳、吳昊、羅卡、金炳興、古蒼梧、岑逸飛等。雜誌剛創立不久，香港就發生六七暴動，這份刊物立即予以譴責，並認為一切都是由香港的左派發動，破壞香港社會安定。但在短短數年之間，《盤古》的編輯方針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轉而變成激進的親中左派喉舌，用文革時期毛派社會主義者的觀點引介西方激進青年運動、批判香港社會，特別是攻擊文化學術界中的右派。所以，《盤古》雜誌的轉向，最能夠反映中共對青年的統戰工作如何影響香港的文化政治格局，在青年人當中產生了由右至左的急劇思想改變<sup>⑨</sup>。

由於這個時期左派激進思想盛行，而中國文革對西方「新左派」有相當大的吸引力和刺激，不少人傾心於紅色中國，視之為理想的人類烏托邦，或者一場偉大的實驗。但在當時的香港，除了左派宣揚的理想之外，更重要的是民族主義的感召。所以，雖然文革思想中並沒有民族主義的元素，只有階級鬥爭和革命的理想，但香港的國粹派則以民族主義承載社會主義，甚至把民族主義放在首位，導致感情掛帥，理論薄弱。當時他們努力緊跟中共方針，一度把香港學運的任務定位為追隨中共革命外交路線的「愛國反霸」。「霸」是指毛澤東三分世界理論中以「蘇修」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帝國主義」，是比「美帝」更邪惡的敵人，因為「蘇修」會在將來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可是，蘇聯在香港並無任何利益，連領事館也沒有設立，何來「反霸」？結果是把矛頭指向香港的托派，因為托派被誣為受「蘇修」所操控。

國粹派的學生歌頌毛澤東，讚美文革，並直接學習和發揚文革中的「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和大部分受冷戰世代反共思想所影響的知識青年不一樣，這些受文革感召的大學生並不接受文革乃中共黨內權力鬥爭的說法，也並不認為文革所造成的破壞和死傷是不可饒恕的罪行，因為他們服膺於一套文革的世界觀，認為一切對文革的負面報導都是帝國主義者為了圍堵「新中國」的抹黑，而就算有部分事實，也只是建設新的理想社會的革命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現象。當然，除了國粹派學生對文革宣傳深信不疑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也被70年代初紅色中國的國際地位突然冒升（加入聯合國、中美建交、中日建交、人造衛星上天以及西方「中國熱」等）所吸引。他們不少是來自中學名校的精英學生，因而成為青年統戰工作的對象；他們也樂意繼續向其他同學開展統戰工作，在所領導的學生組織中宣傳中共的政策。

不過，正是因為要緊貼國內變幻迅速的政治形勢，他們無法維持獨立思考。在文革後期，他們更參加了反對鄧小平復出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以致在毛澤東死後、文革被徹底否定、「四人幫」被批鬥下台之時頓失方所。受此打擊，國粹派主導學運的局面亦於焉瓦解。

## 五 國粹派與托派針鋒相對

在「火紅年代」中，一直和國粹派針鋒相對的是托派和無政府主義者。他們當中有部分是受海外學潮及新激進思想影響的回港留學生，例如莫昭如等人在1970年創辦了《70年代雙周刊》，大幅刊登文章，報導海外青年反抗運動、反抗文化以及第三世界的人民抗爭運動，為香港的青年讀者帶來了新的視野和思想資源，突破了左、右兩派共同壟斷的冷戰思想局面。這份刊物亦利用與讀者的聯繫，連結他們加入社會抗爭。如上所述，其中最重要的是推動了六七暴動後首次帶有反殖色彩的「中文運動」。為了爭論運動的重要性的方向，刊物亦與當時親中的毛派展開辯論。雖然中文運動是打破暴動後社會政治禁忌的重要突破，《70年代雙周刊》也在鼓動青年工人和中學生參與方面



作了很大的貢獻，不過，他們的影響卻未能深入大學院校，原因是大學校園中主導社運的是國粹派，而國粹派則堅決執行「反托」的路線<sup>②</sup>。

事實上，香港托派的歷史傳承是來自中國托派<sup>③</sup>。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尤其是1953年「大肅托」前後，一批中國托派流亡香港（當中有一部分人繼續逃亡歐洲或英國，但部分人隱居香港），秘密進行一些低調的活動。70年代一些托派開始重新活躍，培養青年，當中一些更前往歐洲與那些老中國托派連繫，也有和「第四國際」（Fourth International）這個正規的國際托派組織建立關係。這些青年托派也曾建立不同的運動組織，例如「革馬盟」（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聯盟，出版《戰訊》）、新苗社（出版《新苗》）等。雖然這些托派組織主張各有差異，但都站在香港左翼政治的最激進一翼。相對地，親中的毛派（國粹派）則變成最保守的另一極端。托派既在理論上批判毛澤東，也對中共官僚主義持激烈反對立場，但他們並沒有否定「中國革命」具有其正當性，並非像右派一樣對此全盤否定。不過，他們也一直以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所堅持的國際主義、世界革命觀點來批判國粹派的民族主義；而國粹派則以托派為心腹大敵。兩者在工人和學生的領域常常互相鬥爭。

雖然托派在大學校園被毛派（國粹派）排擠，在社會上也受到左、右兩大黨國文化系統所操控的媒體敵視，但托派在社會上卻發起或介入不少社會運動<sup>④</sup>，例如盲人工潮、「四反運動」（反加價、反失業、反貧窮、反壓迫）、「反貪污、捉葛柏」運動，以及「金禧中學」貪污事件。在這些運動當中，托派和國粹派都針鋒相對<sup>⑤</sup>。雖然這些運動並不能動搖香港的政治體制，但在「火紅年代」對於打破政治冷漠的氣氛、激活反殖意識起着先鋒作用。當時，傾向保守的社運圈子，由於其領導人也是匿名的毛派（例如司徒華所領導的教師運動和教協〔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組織），所以都一樣排斥托派。意識形態的分歧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托派所堅持的激進姿態和行動至上的風格，也使他們和其他比較保守的社運組織存在不少分歧。



「反貪污、捉葛柏」運動。（資料圖片）

## 六 社會派與「火紅年代」之後的民主運動

在大學校園內，托派並沒有取得過社運的領導地位，只能繼續和主導的國粹派爭一日之長短。唯一能和國粹派抗衡的是「社會派」，以及有另類激進思想資源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學生「社關」（社會關懷）組織。所謂「社會派」，是大學校園內不滿國粹派的學運份子的統稱，基本上也是抱持左翼的價值觀，對殖民地現狀和資本主義抱批判態度，亦基本上肯定中國民族主義。不過，社會派和社關組織沒有後者的龐大組織能力。他們的共通點只在於拒絕國粹派無條件追隨中共的做法。在學運方針上，更多強調社會參與而非以情感帶動來認識中國。

社會派中也可以再區分出對中國興趣較大、理論分析和研究傾向較強的一群，以及有更強的傾向投入社會改革和建立民主草根組織的另一群。前者在學運走向低潮之後，轉化為一些論政組織，例如以推動「民主回歸」立場而知名的「匯點」（後與香港民主同盟組成民主黨）；而後者則有不少投身社區，建立社區組織，並且以此為基礎，參與80年代初的區議會選舉，成為以參與選舉政治來推動民主運動的「民主派」，例如「民協」（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這些廣義的民主派都或多或少傳承着「火紅年代」的學運回憶，將那個年代視為他們投身政治的起步點。不過，他們在愈來愈體制化的民主選舉制度中，都告別了在年青時期為意識形態理想而提出的爭辯，全力投入以選舉為核心的政治生涯。

相對之下，當年親中的國粹派在文革結束、「四人幫」倒台及鄧小平復出主理改革開放事業之後，在80年代紛紛遠離政治，走向犬儒和沉默，消失在香港的政治舞台上。但隨着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部分當年的國粹派領導人物（例如梁錦松），因着與中國內地的各種關係和人脈，反過來變成香港建制派的一份子，進入統治集團中間，而只有極少數重新投入社會運動（例如楊寶熙）。另一方面，托派份子則繼續維持其永遠的異見抗議角色，並轉化成為社運的其中一股重要力量，從事基層勞工工作；至於當年那些托派組織則已經紛紛解散。

## 七 獨立工運、公民社會、文化左翼

在70年代，學生運動、工人運動和地區居民權益運動是香港社會運動的主要形式。學運有較多的意識形態爭論，而在校園之外，除了托派堅持宣傳其信奉的革命馬克思主義，其他社運則較少發起有關理論的爭論。不過，在托派和國粹派之外，宗教領域也引進了一些激進主義的資源。香港的天主教會雖然一貫比較保守，但70年代天主教會內部也透過一些外籍神父引進了解放神學。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和它的刊物《曙暉》，在這方面擔當過推動角色<sup>19</sup>。另外，香港的基督新教宗派繁多，其中戰後擴展得最快的，是1949年由中國內地南逃到香港的福音派教會。這些教會一般都有受共產黨打壓的背景，亦強

調信仰與政治應互不相涉。但在1974年福音派的洛桑會議(Lausanne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之後，也有部分教會人士打出「關社」的旗號，積極鼓勵信徒以信仰角度介入社會，並在多個範疇協助建立民間組織，推動社運，成為日後香港公民社會的基石<sup>15</sup>。

70年代初，獨立工運的出現，打破了一直以來工會分別由傳統左、右兩派組織和控制的局面。獨立工運的出現不單增強工人階級團結，推動工人在行業和工作崗位上爭取權益，更主動向政府爭取勞工立法，改善勞資關係。獨立工會更傾向於發起跨界別行動，連結各界組成市民聯合陣線，以和平、非暴力的公民抗爭方式向政府施加壓力<sup>16</sup>，所以也是香港公民社會和公民運動在80年代漸次發展起來的其中一股主要力量。

80年代開始，因為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談判，政府開始下放部分地方行政權力，以民選方式選出區議員，引入選舉政治。不少原來的居民運動組織被吸納入政黨，民主政治運動環繞選舉而開展，成為民主運動的主流。同時，80、90年代主張各式議題的民間組織一直蓬勃發展，活躍的公民社會和政黨保持距離。它們在政治民主權利的倡議上，互相合作，但在個別社會改革議程上，各自發起社運，形成一個與政黨(以民主派為主流)平行的泛左翼力量。

除了發起並參與社會運動之外，部分70年代激進左翼及社會派領袖，也曾在70年代末期轉化成一個小型文化左翼圈子。1978年，曾澍基、黎則奮等人出版了《文化新潮》雜誌，對快速走進消費資本主義的香港留下文化批判的傳統，把西方的「文化馬克思主義」付諸實踐<sup>17</sup>。刊物把新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以及符號學等左翼理論帶入香港，並結合一些衝擊文化產業機構的社會行動，提倡「文化批判」的思潮，鼓動新左翼的意識形態鬥爭，找尋新的文化創作方針。他們倡導知識份子加入文化工業，介入文化生產環節，參與意識形態鬥爭。他們也挑戰右派舊文化人在報業的權威地位，以及對親中左派的機會主義、「風派」作風和道德主義的虛偽予以批判。雖然這些激進行動後來並沒有繼續發展，但也啟導了一種具有獨立性和批判性的文化實踐試驗，抗衡受傳統左、右黨政系統以及大資本控制的文化工業。

在80年代，雖然這些文化激進派也開始星散，但其思想餘波仍然可以在香港「新浪潮」電影、街頭劇運動、獨立書店、前衛音樂和不同的藝術文化實踐中找到痕迹。這些激進文化力量在80年代末支持北京的學生運動期間，也重新活躍起來，當中一些前托派積極份子和進步學生，更走在政黨和民間組織前頭<sup>18</sup>。香港延續了二十多年至今未衰的六四悼念活動，也是緣起自70年代那種異見左翼文化的實踐。

## 八 總結

歷史學家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人曾經論說，1968年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發展史上的一個分水嶺<sup>19</sup>。在這一年之前，針對資本主義的反

體系運動是以爭奪國家權力，來挑戰資本主義體系的運作邏輯。可是，在1968年（或廣義的60年代）之後，這套「舊左派」的反體系運動已經走到盡頭，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全新的反體系邏輯。雖然不以爭取國家權力為目標的新的反體系運動本身還是有很多問題，但它們開創了新的範式。如果我們用長時段的歷史眼光去看60年代，就會發現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分水嶺。

的而且確，60年代全球性的左翼運動是以超越美蘇的冷戰對立體制為基礎，西方「新左派」既反對資本主義，也反對國家社會主義。這股反叛浪潮帶來了各種新社會運動，放棄「舊左派」爭奪國家權力、以工人階級為中心的政治模式。不過這股運動的高潮在70年代漸漸退卻，因為部分青年採取了暴力的極端主義行動，60年代的青年反叛浪潮於是逐步從高潮滑落。香港處身於中國與西方的交界地帶，既受中共領導的左派系統影響，也受西方「新左派」以及其他激進思潮的衝擊，而且也部分傳承了中國托派的遺產。與台灣青年大量留學美國不太一樣，香港青年左翼思想資源也來自英國、歐洲、澳洲等地，既有反美也有反中共的傳統。

西方學生和青年運動的浪潮在60年代沒有在香港引來即時的響應，是因為當時中國爆發的文革正透過親中左派直接延伸到香港。六七暴動先於70年代「火紅年代」的出現，弔詭地讓「舊左派」國家主義忠誠的弊病坦露，而暴動的失敗，卻未致使左派一沉不起。倒是香港的冷戰文化格局被徹底打破，並且讓右派主導的青年思潮向左大幅搖擺。撇除了國粹派所走過的那條彎路，「火紅年代」仍是一個歷史的分水嶺，當時新開啟的「後冷戰對抗」空間，讓非親中的左翼，在70年代的學生運動、青年運動和獨立工會運動等的新平台上有了開展的可能，並且首次在香港完整地提出「反資反殖」的左翼激進主義訴求，而非聽命於共產黨默許的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之間的共謀體制。

從思想尺度來說，雖然當時這些思想相當激進，青年人在脫離既有思想框框，打破一切政治或理論權威的情況下論辯香港前途、探索革命遠景，但當轉化為社區實踐、打破殖民主義政治箝制和保守主義氛圍的行動時，卻是和平、非暴力的公民行動，促使公民社會快速成長，使得香港日後的反對派實踐，並不受單一意識形態所指揮。因為經過「火紅年代」的衝擊和調節，香港的反抗文化已變成一種融匯各種反抗和異見想像的文化匯成（cultural syncretism）。這種反抗文化，既有華勒斯坦所描述的新社會運動成份，也有與其論斷有所不同的成份。

「火紅年代」的香港學生和青年運動，並沒有能力把香港從她一貫的殖民主義資本主義體制改變過來。但如非當時有由非親中左翼提出了諸如「反資反殖」的徹底批判聲音，形成一股一直頑強不滅的非主流政治傳統，香港就不可能在70年代之後能夠持續地維持異見，為香港社會創造另一個面貌。事實上，「火紅年代」激進思想探索未來想像的衝動至今仍未消失，一如《70年代雙周刊》創辦人暨戲劇藝術家莫昭如所認為，「……覺得自己沒有經歷過革命理想的幻滅，最少是因為，社會上不會有一種革命意欲的真正滅絕，『中國民運、香港社運，一路有延續與承傳，不過有高低跌宕吧』……身在運動的版圖裏，『你不知道高潮何時來臨，永遠都要在準備，但永遠都準備不夠。』」◎



## 註釋

- ① 鄭樹森：〈東西冷戰、左右對疊、香港文學〉、〈1997前香港在海峽兩岸間的文化中介〉，載馮品佳編：《通識人文十一講》（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頁165-72、173-98。
- ② 毛蘭友：〈回憶六十年代〉，載吳仲賢：《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吳葉麗容，1997），頁820-28。
- ③ 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
- ④ 也斯：〈解讀一個神話？——試談《中國學生周報》〉，《讀書人》，第26期（1997年4月），頁64-71；陳文鴻：〈落後於社會變遷——談《周報》的「政治觀」〉，《博益月刊》，第14期（1988年10月），頁118-21；盧瑋鑾：《香港故事：個人回憶與文學思考》（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頁46-73。
- ⑤ 羅永生：〈冷戰中的解殖：香港「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評析〉，《思想香港》，第6期（2015年3月），頁23-46，[http://media.wix.com/ugd/46d502\\_1fdcd53ec28046dab072dca853fe183b.pdf](http://media.wix.com/ugd/46d502_1fdcd53ec28046dab072dca853fe183b.pdf)。
- ⑥⑦ 參見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1983）。
- ⑧ 作為聯繫各大專院校的學聯，在學運高潮的時候提出「放、認、關、爭」的四字口號，意指「放眼世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爭取權益」。當中「認識中國」還是「認識祖國」是一個派別分歧的爭論焦點，而「認」究竟是指「認識」還是「認同」是另一個爭論焦點。兩者都和對新中國的態度有直接關係。
- ⑨ 羅永生：〈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回歸論述〉，《人間思想》，2012年第1期，頁191-209。
- ⑩ 星河：〈香港托派與青年學生運動〉，《風雷》，1975年創刊號，頁8-17。
- ⑪ 吳基民：《煉獄：中國托派的苦難與奮鬥》（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08）。
- ⑫ 李志平：〈群眾運動中的反托傾向〉，《戰訊》，1979年3-4月號，頁9。
- ⑬ 〈托派如何插手學生運動〉，載《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頁90-93。
- ⑭ 劉麗凝整理：〈火紅年代的天主教大專聯會〉、〈「服侍最小的兄弟」：七、八十年代天主教的社會運動〉，《思想香港》，第4期（2014年6月），頁1-12、13-20，[http://media.wix.com/ugd/46d502\\_142d8160901c45fc8b218b3ab50cadaa.pdf](http://media.wix.com/ugd/46d502_142d8160901c45fc8b218b3ab50cadaa.pdf)。
- ⑮ 黎惠儀、張穎珊：〈歷史篇：與時代處境同游的FES〉，載FES研究及對外訓練部編：《FES五十周年特刊：生不盡 火在燒——FES與學生福音運動（1957-2007）》（香港：FES，2007），頁11-43。
- ⑯ 潘文瀚等：《團結不折彎：香港獨立工運尋索40年》（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12）。
- ⑰ 方卡謬：《反調》（香港：廣角鏡，1984），頁117-33；趙來發：〈香港沒有新左派〉，《文化現場》，第6期（2008年10月），頁14-17。《文化新潮》各期內容可參見[www.sensibility1978.com/](http://www.sensibility1978.com/)。
- ⑱ 例如有不少前托派份子組成的小型行動組織「四五行動」，在支援1989年北京學生運動中扮演了先鋒角色，相對於當時反應非常緩慢的主流民主派和民間團體，「四五行動」的前期介入，對香港人後來大幅參與八九學運的影響甚大。
- ⑲ Immanuel Wallerstein and Sharon Zukin, "1968, Revolution in the World-system: Theses and Queries", *Theory and Society* 18, no. 4 (1989): 431-49.
- ⑳ 〈每有「70人」離去——傅魯炳和同行者的故事〉（2008年3月13日），獨立媒體網，[www.inmediahk.net/node/309985](http://www.inmediahk.net/node/309985)。